

东周战争与 儒法国家的诞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何以这个时代成为帝国诞生的枢机？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周战争与 儒法国家的诞生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修订本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17-8703-8

I. ①东… II. ①赵…②夏…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IV. 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823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赵鼎新 著
夏江旗 译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
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703-8/K·349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傅石榴并纪念先父赵仲辉

作者序

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批林批孔”的闹剧。在此期间，极“左”势力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把中国历史演绎成一部阶级斗争史，把所谓的儒、法斗争描述为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以此影射现实政治和扩大文革的打击面（即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文革”期间，在“上山下乡”的大环境下我离开上海去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我在银川一家工厂当工人。该工厂主管宣传的干事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据说他是著名散文家秦牧的高足，“文革”中因受牵连而被下放到宁夏。“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极“左”势力动员普通百姓在工厂甚至农村写各种批判文章，为运动造势。在此环境下，我所在厂的宣传干事牵头组织了一个由五个青年工人组成的学习和写作小组，我有幸忝列其中。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一个极其畸形的环境，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我从未有机会接触过任何教科书以外的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而加入这一小组使我第一次有机会阅读荀子、韩非子、孟子和孔子等人的哲学著作与《盐铁论》和《封建论》等历史名篇，

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当代著述。虽然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低，所看过的一些当代著述的观点也十分偏颇，但即便如此，在读了一些原著和历史书籍后，直觉仍然告诉我：中国历代思想家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儒家或法家；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什么儒、法斗争史。这就让我产生了困惑。在当时的环境下，任何思想上的困惑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远的不说，在我们的厂里就有一位青年工人在小组会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仅仅因为说了一句“刘少奇说的都是一些大实话”而受到批判并被处以记过。在这种环境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结果，在参加学习小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贡献过一行字。我的这种表现使我成了小组中的落后分子，特别是与我的一个好友相比——他在小组中脱颖而出，连续在当时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在那位宣传干事眼里，我显然是一个不求上进的青年。我能看出他对我的失望，有时也为之惭愧不已。但是，这次学习小组的经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当时本来是很难接触到的古籍，我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兴趣大大加深，并从此经常思索中国历史的种种特点及其解释。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之路。此间出现了“伤痕文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热”（即把文革的悲剧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专制性，从而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鞭挞）。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开放浪潮中有一本书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该书提出了帝制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

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得以延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顶多处于边缘状态,它们只是王朝崩溃之前出现的“假资本主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发表时正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文革”悲剧进行反思之际。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文革”的起源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文化。而金、刘两氏的著作则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久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们的著作在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尚很盛行的当时让人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该书一经发表马上就引起了它应有的轰动,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金观涛和刘青峰工作的刺激下,当时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我却保留了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大历史的兴趣。就这样,在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这些特殊性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总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悬在我的脑海中。

1990年我弃理从文转攻社会学。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研究的都是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但我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兴趣始终浓厚。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率先在欧洲兴起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分析和解释),阅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对

中国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历史所做的分析。这些著作的质量有高有低,但是阅读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兴趣。我对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解释也在这些阅读和思考中逐渐成型。

三年多前,在完成了一系列社会学领域的工作之后,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我开始了一个以春秋—战国史为核心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在此工作展开一年后,我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表达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我的整个工作计划制定一个提纲——它既能整理我的思路,又能达到在朋友间传阅以征求意见的目的。在此文的传阅过程中,我的两位年轻朋友——林国基和林国荣——认为国外做学问周期太长,而本文具有一本小册子的篇幅且有很大的独立性,探讨的又是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应该在国内先行发表,以飨读者。他俩为本书寻找了出版社和翻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多次敦促协调。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友谊,本书不可能问世,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夏江旗完成。江旗手头上有不少课题,翻译工作因而时断时续。但是为了翻译此书,江旗曾反复阅读《左传》和《史记》等古籍,对那段历史用心揣摩,在文字上也下了很大工夫,我在此对他谨表谢意。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中 William Parish、Edward Laumann、Andrew Abbott、冯仕政等人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

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我最近几年的工作都旨在对本书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加以弥补。不过，随着我最近工作的日益深入，早期的许多非根本性的观点也在不断得到纠正，但我目前的工作尚未对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形成挑战。因此，我想借本书在国内的发表以抛砖引玉，希冀得到国内同仁的批评指正。

赵鼎新

2006年5月于芝加哥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6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12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20
第五章	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34
第六章	东周历史的分期	43
第七章	霸主时期(公元前 770—前 546 年)	52
第八章	转型期(公元前 546—前 413 年)	76
第九章	全民战争期(公元前 419—前 211 年)	102
第十章	儒法国家的形成	148
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的模式	165
附录一:	本书对东周时期战争信息的计量方法	183
附录二: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 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185
附录三:	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198
	主要原始文献	213
	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引论

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相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中国历史至少呈现出了如下七项主要政治特征:

一、世界史上其他诸帝国一旦隳灭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 221 年秦帝国建立迨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二、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①

三、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51: 第 61—62 页)指出,中国战国时代与近代欧洲都存在着一个相似的“行政管理理性化”过程。他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学者之一。

五、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Creel, 1970: 第 197 页)。

六、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

七、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 年)时期,亦是如此。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上述诸多不同?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将对帝制中国的以上七个政治特征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前 221 年)至西汉前叶(公元前 206—前 140 年)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帝制中国的上述特征,皆可于这一历史阶段察其端倪。因此,本书的另一主要目的便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作出分析和解释。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譬如,与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相比)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6 年)

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正如下文将要阐明的,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皆与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的独特结晶形态密切相关。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所总结的帝制中国政治的七项特征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每天都有众多的、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而在如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寻常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提出研究新视角。于是乎,当有人提出帝制时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中心时,便有人反驳说,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帝制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主要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小型市镇;当有人立论说帝制时代中国的军人势力在政治上处于附属地位时,便有人拿出军阀乱政的史实来反对;当有人强调帝制中国的内敛性时,便有人举出帝制中国历史上对周边地区的征伐活动,特别是李唐(618—907 年)初年和朱明一朝(1368—1644 年)的例子。同样,以早先历史学家所总结出的帝制中国的其他某些政治特征为靶子,我们对帝制中国的历史也可以作出类似的批判,并拓展出相应的研究方向,这里就不再枚举了。但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帝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内部差异为何,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均是能够成立的。诚然,帝制时代的中国确曾有过军阀乱国甚至建立军阀政府的情况,但若与

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军人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 and 影响相比,中国帝制时代的军队在政治上的影响便立刻显得微不足道。尽管帝制时代尤其是中唐以后,中国城市的性质较先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前现代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从未产生过能够平衡、甚至对抗国家权力的力量。本书所概括的关于帝制中国的其他几项特征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予以辩护和证明,此处不再赘述。要言之,关注帝制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无疑能够为我们带来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和洞见,但是,它们并不可能对本书所概括的中国历史的上述七个政治特征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当然,这七个特征都不是笔者的创见。自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以降,中国历史的这些特征不但曾经被广泛接受,而且还在各种分析和研究中被当作事实依据而广泛使用(如: Creel, 1970; Eisenstadt, 1986; Fairbank and Goldman, 1998; Hsu, 1965; Huang, 1997; McNeill, 1982; Wittfogel, 1957)。在对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近代欧洲式的“理性化过程”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51, 1958)至少对上述七种历史特征中的四种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强国家传统、缺乏政治自治性的城市;儒家对各色宗教和崇拜的容忍、文官政府(及其与近代欧洲“行政管理理性化”现象的相似之处)。在对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进行比较时,赫尔利·顾立雅(Creel, 1970: 第1—28页)曾总结出上述七个历史特征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最近在其力作《政府史》中,费讷(Finer, 1997)几乎提到了上述帝制中国七个历史特征的全部内容。遗憾的是,顾立雅和费讷均未对上述历史特征形成的原因这一根本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果套用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来类比,本书与韦伯著作的不同之处可以这样来看待:韦伯在其工作中将上述历史模式

视为“自变量”，并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本书则将上述历史模式视为“因变量”，试图探明其得以发轫和形成的原因。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本书所关注的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也趋于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哲学、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春秋到战国,小规模局部性战争发展为有庞大军队参加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长距离作战的总体性战争,职业化军人和军事谋略家(诸子百家中的“兵家”)群体逐渐兴起,军事后勤及其他军事技术获得了长足改进。

其次,哲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后世所说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开出济世药方,小至家庭伦理,大至国家、社会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中国文化的哲学和宗教基础亦由此奠定。

最后,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得

